

《春秋》是史还是经？

春秋本是四时之名，一春一秋即为一年，于是古人纪事时用春夏秋冬表明时间。后来“春秋”二字就逐渐演化成了历史记载的代名词，春秋时期的人也用“春秋”来指代各国的史书。鲁国的史官们亦是如此，他们也用“春秋”二字来指代本国的史书。孔子游历各国，晚年回到鲁国，对各种历史记载加以整理，修成《春秋》一书。

自儒家学派发展壮大以至成为官学以来，对于《春秋》一书究竟是经还是史的争论就一直存在。经，即儒家经典著作，更偏向于思想、政治；史，即史书，历史学著作。虽然很多儒家学者都认为《春秋》应被归入经的行列，列出“六经”、“五经”、“九经”、“十三经”等都包括《春秋》，并将《春秋》作为经书加以解读，谓之“解经”。但同时，每个时代都有不少的学者认为《春秋》仅是一部史书，而非经书，例如朱熹就曾说过“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即，孔子修成《春秋》，只是直接记述了当时发生的事，何为善何为恶，自然能从中看出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较偏向与认为春秋是史而非经。

首先，若《春秋》一书是孔子为了教化后人而写，为何记载如此简略，以至要解读孔子的深意，需要从逐字斟酌，从中解读出“微言大义”来？《春秋》以编年体的体裁记载了鲁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间，春秋各国共二百四十四年的历史。虽然记载的历史跨度有二百余年，但总共只有一万六千多字¹，平均每年一百多字。以这样的篇幅，则只能对这一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以寥寥数字加以概括，例如，桓公三年的记载如下：

春正月，公会齐侯于赢。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六月，公会杞侯于郕。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公子翬如齐逆女。九月，齐侯送姜氏于欢。公会齐侯于欢。夫人姜氏至自齐。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有年。

这么简短的记载，我们只能从中得知当年有何重大政治事件发生，除此之外没有多余词句。试问，若《春秋》真是像《礼记》、《尚书》、《论语》等一样的经，那用如此简略、平铺直叙的记载，如何能起到“教化后人”之用？若是结合《左传》补充的历史背景，《公羊》《谷梁》二传对《春秋》的开创性的解读，将《春秋》及其三传视为一体，那这四部书自然可视为一部“经”，书中形成的道德评价体系、价值观念自然能起到教化后人之用。但单独拿出《春秋》一书来看，《春秋》篇幅过于简短、用语太过简洁，难以承载后人赋予其的“微言大义”，而正是《春秋》这样“直书其事”的忠实记录，使得它成为了一部开创中国史家先河的史书。

其次，传统儒家学者一般认为《春秋》是经，于是对其按照一部经那样，进行逐字逐句的细微解读，从中阐发出经文的“微言大义”来。但从刚才所引的一段《春秋》原文可以看到，《春秋》全文记载的基本格式为，“某年，某季节某月，某某人于某地做某事”。同时按照当时的历史记录“写作规范”，根据人物的身份、行为使用相符合的用词，例如引文中“公会杞侯于郕”，就根据人物身份，称呼为“公”、“杞侯”，对其国君见面会谈的行为描述为“会”；宣公七年，“公会齐侯伐莱”，以“伐”字描述诸侯之间的战争；宣公元年，“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以“弑”字形容臣子杀君王的行为。这一些能够从书中总结出来的用词规范、惯例等，与我们现在的新闻通讯、报道的写作、用词规范又有何不同？中国的史官常在记录历史时，对一些事情常在用辞上或褒或贬，春秋的史官们就已经开始有了这样的倾向²，孔子在修《春秋》时的一些用辞也是对这一倾向的继承。在如果深究这些词句有何用意，则能够探寻到的应是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时的人们以及孔子本人的世界观、道德观等。因为一篇文章的用词倾向、习惯等能够明显的反映出作者的认识水平和价值取向，甚至反映出作

¹ 楊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版).前言[M]:15

² 楊伯峻.春秋左传注(修订版).前言[M]:7

者所处文化环境有何特点。正如我们在阅读英文报导时会发现，信奉“自由民主”观念的西方人士习惯于用“regime”一词来指称“邪恶的”独裁政府，而对其他国家政府则以“state”“government”等中性的词来指称。又说若是要从这些细碎的词句中能够解读出什么“微言大义”来，那正如钱穆先生所言³，“但所谓大义，亦不该求之过深，尊之过高。讲大义若讲过了头，反会落入小节中去。”所以就这方面而言，我也认为春秋应当作为一部史来看待，而非像历朝历代的儒学家一样视之为经。

诚然，《春秋》作为儒家开创者孔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儒家学派留给我们的一部文化瑰宝。孔子在修《春秋》时，不可避免地会在选取材料，修改用辞的过程中留下个人痕迹，即孔子本人对某事的褒贬倾向、道德评判等。如果我们要研习儒学，或者研究孔子，那就必须要深入研读《春秋》，挖掘出其中蕴含的孔子的思想及其看法。所以，三传正是起到了这样的作用，结合《左传》《公羊》《谷梁传》三传中对历史事实的补充，词义、用意、内容的解释，对经文的归纳总结等，才能对《春秋》中隐含的孔子思想及态度有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儒家将《春秋》作为一部经典，并通过“解经”的方式解读其“微言大义”，并总结出系统的思想体系，给出价值判断和道德评价标准，这并不能说明《春秋》是一部经。因《春秋》为孔子所修，所以可以用之解读孔子留给后人的思想，于是站在儒家的视角下，《春秋》当然是一部经。但对于《春秋》是经还是史，站在不同立场，有着不同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研究需要的人会给出不同的答案。如果我们假设一个外星人来了解儒家学说，那么他们会如何理解《春秋》这部作品的性质？《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⁴，在中国，以对儒家经典《五经》的阐释和研究形成的儒家观念为基础，形成了一个类似宗教的生活方式和认识体系——并称之为“儒教”，而《春秋经》，则是儒教内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一部简短的编年体史书。而另一边，很多海外的儒学研究者⁵，如“波士顿儒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则会从解读儒家经典著作的角度认为，《春秋》应当是一部经。所以，假设我们像孔子修《春秋》，将各国国史统一为一部“诸夏的国际史”一样，从外观之，那么《春秋》显然首先是一部记录了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历史的编年体史书，其次才是承载了孔子观念的儒家之“经”，就此而言，我仍可认为，《春秋》是一部史，而非经。

到这里，我的观点已经较为明确了，一则《春秋》篇幅过于简短，不足以承载“经”教化后人的功用；二则追求把《春秋》当作经文来解读，分析字句，是舍本逐末，观《春秋》之大义，应将其视为史；三则对《春秋》性质的解读会受到各人所处立场、研究所需，先入为主的文化背景的影响，若要跳脱来看，显然将《春秋》当作一部史书更为合适。综上，我认为《春秋》应当是一部史。

³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春秋[M]:7

⁴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从史前史到 21 世纪：全球通史[M]:157

⁵ 程志华.由“儒学在美国”到“美国的儒学”:百年美国儒学发展脉络[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34(03):5-16.